



ZHONGGUO JINDAI GUOMINXING WENTI
YANJIU DE LILUN SHIYU JIQI JIAZHI

中国近代国民性 问题研究的 理论视阈及其价值

教军章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ZHONGGUO JINDAI GUOMINXING WENTI
YANJIU DE LILUN SHIYU JIQI JIAZHI

中国近代国民性 问题研究的 理论视阈及其价值

教军章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近代国民性问题研究的理论视阈及其价值 / 教军章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3

ISBN 978-7-5004-7653-5

I. 中… II. 教… III. 民族性 - 问题 - 研究 - 中国 - 近代 IV. C95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25931 号

责任编辑 喻 苗

责任校对 王雪梅

封面设计 王 华

版式设计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0.25

插 页 2

字 数 256 千字

定 价 2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张锡勤

要求对中国的“国民性”进行改造，是中国近代思想领域的一件大事，它曾受到几代中国改革者的持续关注。“国民性”的提出，特别是对中国国民性中种种“劣点”的揭示，并不始于中国人，而是始于来华、在华的西方人士。中国人自己开始自觉地关注并清算自身的缺点，是受了严复所介绍的社会有机体说的刺激、影响。严复依据他对社会有机体说的理解，认为社会成员与社会的关系如同细胞与生物体的关系。既然生物体的性质、特征取决于构成它的细胞，那么，一国一群的面貌特征则取决于组成它的社会成员的状况。他曾一再说：“国之强弱、贫富、治乱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征验也。”在他看来，那时西方所以富强，是由于其民德、智、体三者皆优；中国所以贫弱则是因为中国“民力已荏，民智已卑，民德已薄”，三者皆劣。因此，中国欲求富强振兴，就应立即着手提高全民的基本素质。对于中国的变革、振兴而言，使民实现德、智、体三强乃是根本，是必不可少的基础建设，否则必将导致或“淮橘成枳”，或“人亡政息”的后果。正是严复的这些议论，引发了那时中国的改革者、新学家们对国民性改造的关注。

20世纪初，梁启超名噪一时的《新民说》主旨即是改造国民性，造就一代新人。那时，鼓吹国民性改造的不只是维新派人

士，还有继起的革命党人，而且，偏重探讨学术问题的《东方杂志》也刊登了一些论说国民性和国民性改造的文字。1915年，新文化运动兴起后，要求改造国民性的呼声更高，影响也更大。一时间，“民质而优则其国必昌，民质而劣则其国必亡”的认识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所认同。直到1925年，鲁迅仍认为：“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可见，在那时改革者的心目中，国民性改造是多么重要！

在中国近代，国民性改造问题的提出引发了国人对人的近代化的关注，使人们认识到：不论是破坏旧世界还是建设新世界，都要依靠觉醒中的一代新人；离开人自身的近代化，社会的近代化就没有坚实的基础。正是基于这些认识，近代的改革者、新学家们不仅要求实现人的解放，还呼吁实现人的重塑。从此，提高全民素质、振奋民族精神、造就一代新人的历史任务便提上了日程，中国的改革者们对于近代化有了更加全面的理解和规划。

不过，在中国近代，关于国民性改造的讨论也曾走过一段弯路。由于受斯宾塞社会有机体说的影响，在开头一个时期，人们只强调个体对群体、个人对社会的决定作用，走向了单项决定论。这种单项决定论认为，只要人人成为一代新人，新的社会制度就一定会到来。这种理论势必使人轻忽以致放弃对社会制度的改造、变革。而且，一旦脱离社会变革的实践而孤立地谈个体人的自新，那么国民性改造也就成了孤立的个体行为，难以取得实效。所幸的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走向深入之际，人们开始走出这一理论误区，逐渐认识到个人与社会、人的近代化与社会近代化乃是一种双向影响、双向互动的关系，改造个人当在改造社会的过程中实现，因此社会改造具有了优先性。这就纠正了此前单项决定论的偏失。

今天，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提升我国综合国力的

进程中，如何提高全民的基本素质，造就社会主义的一代新人，依然是一项艰巨的历史任务和必不可少的基础建设。在这一过程中，回顾、反思百年前的那场大讨论，汲取前人的理论成果，无疑具有启示、借鉴意义。正因为如此，中国近代的国民性改造一直受到学人的关注。

教军章教授在长期从事行政管理教学与研究的同时，对中国近代思想史、文化史一直予以关注。经由数年努力，现已撰成《中国近代国民性问题研究的理论视阈及其价值》一书。本书通过征引大量翔实的史料，对国民性问题研究的来龙去脉作了系统的、追本溯源的历史追踪；对不同时期中西学者对国民性内涵的种种不同认识和表述作了评介。它着重分析了中国近代国民性问题讨论、研究的理论成就与缺失，以及这一问题研究的深层价值。本书在结语部分指出：“现代政治与政府管理的目标可以高度概括为追求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而“人的现代化发展无疑是最为核心的部分，国民性格重塑问题则包含在其中”。这段话对研究近代国民性改造问题的现实意义作了概括的说明。我相信，本书的出版对于推动这一问题研究的深入，引发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是为序。

2008年6月18日

于黑龙江大学

目 录

序	(1)
导言 关于近代国民性研究的基本问题	(1)
一 问题的性质	(2)
二 研究的状况	(7)
三 蕴涵的意义	(13)
四 选择的视角	(16)
第一章 历史追踪：中国国民性问题研究概览	(19)
一 问题缘起：西方对东方的历史回观	(19)
(一) 从惊羨的开端到顶礼膜拜	(20)
(二) 充满想象的偏执批判：从美誉到丑化	(26)
二 问题提出：国人的初步反省	(31)
三 问题深化：国民性问题的批判主调	(39)
四 问题延展：国民性问题批判性反思	(50)
(一) 对传统文化的冷静思考	(51)
(二) 相对系统的国民性表述	(58)
(三) 国民性问题学术论争的展开	(63)
第二章 从意涵到概念：国民性的理性阐释与界说	(72)
一 国民性概念的认知分野	(73)
(一) 西方学界的国民性意涵	(75)
(二) 中国学术界的国民性定位	(91)
二 关于国民性概念分歧的分析	(106)

(一) 国民性概念的批评	(107)
(二) 国民性概念旨趣的认识	(111)
(三) 国民性内涵: 界定与理解	(119)
第三章 近代中国国民性研究的理论成就	(126)
一 国民性问题之背景: 比较视阈下的中西文化差异	(127)
(一) 东西文化比较的初步尝试	(129)
(二) 东西文化差异的学理定位	(134)
二 国民性之地位: 从单项决定到双向互动	(137)
(一) 个体改造单项决定意义的理论阐释	(138)
(二) 由个体改造到个体与社会共同改造	(149)
三 国民性之生成: 历史的传承与现实的观照	(152)
(一) 对封建制度的根源性揭示	(153)
(二) 由制度到伦理文化的根源性定位	(159)
四 国民性之诸种表现: 对民族劣根性批判的过多关注	(164)
(一) 国民性批判主调的生成	(165)
(二) 国民性批判的宏观评析	(174)
五 国民性之改造: 人的近代化取向	(185)
(一) 国民德智体提高的系统表述	(186)
(二) 国民科学与民主精神的张扬	(191)
第四章 近代中国国民性研究的理论缺失	(198)
一 绝对化的“本质主义”倾向: 国民性表述的逻辑归向	(199)
二 文化虚无主义流弊: 西方化、东方化与现代化碰撞	(209)
三 政治与学术使命的交锋: 政治理性的文化乌托邦构想	(220)

第五章 中国近代国民性问题研究的深层价值	(231)
一 社会意义的凝思——追寻主体个性与共性的 历史统一	(232)
(一) 在历史发展中超越文化生命限域	(233)
(二) 激活社会发展的文化动力	(241)
(三) 从日常行为审视文化国民的社会意蕴	(246)
二 文化的民族性表达——国民文化特质讨论的 接续	(251)
(一) 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恒久碰撞	(252)
(二) 在比较中定位多层次文化契合点	(259)
(三) 探索中国民族文化发展模式	(264)
三 政治发展中的国民性重塑——历史使命与 政治责任的现实切换	(271)
(一) 政治发展与国民性改造	(272)
(二) 国民性格塑造的制度化与伦理化途径	(277)
(三) 政治责任的归宿：重塑优良的中国 国民性格	(288)
结语：民族国家现代化面临的永恒课业	(296)
参考文献	(302)
后记	(316)

导言：关于近代国民性研究的 基本问题

问题的性质·研究的状况

蕴涵的意义·选择的视角

中国国民问题的研究无论如何都是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当然也就是救亡与启蒙发展史——中需要浓彩重墨地加以精心描绘的时代论题，它经历百余年褒贬起伏的曲折历程至今仍然为人们咀嚼的话语主题之一，并在学理研究上不时形成论辩的焦点，这足以说明其蕴涵意义的丰富性和重要性。当20世纪著名哲学家伯兰特·罗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来中国游学后以《中国问题》（*The Problem of China*, 1922）为总标题发表其关于中西文化比较的宏论时，西方的中国问题研究已经经历了数百年的风雨历程，其中有因倾心向往的情结而大加美誉或神话者，有因理性的思索而加以描画或叙事者，更有“非我族类”的文化—文明批判或诋毁者。这数百年历史涤荡的关于中国的报道、记事、传说、想象、对话而形成的文本无论是褒扬还是贬抑似乎都足以使中国及其民族在西方世界（主要是欧洲）构成一股股汹涌的浪潮，绵延着民族文化或文明碰撞产生的迭迭激情，在交融与冲突中玩味着其中的意义。当它被人们冠之以“中国学”矗立于世界学术殿堂，也便标志着理性的、非理性的“中国认识”随着历史演进的轨迹在褒贬

毁誉的潮起潮落中获得了合法性地位。^①“中国问题”或“中国学”显然包含着极其丰富的资源，国民性问题只是其中曾被重点关照的一个话题，然而就是这个话题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思想界产生了民族历史未曾有过的生死阵痛般的省悟，在国人心中引发了关于民族生存境遇的危机意识，并由此从主体层面进行了深度思考。面对西方世界勃勃生机的虎狼之相和中国家园残破的羸弱之骸，一部分中国人在强烈痛楚中逐渐觉醒，从内外两方面寻求治本之方：地主阶级政治改革呼吁、农民阶级揭竿起义、洋务官僚器物思变、维新志士变法改制、革命党人喋血沙场、文化旗手深度启蒙……他们或竭力呐喊或践于奔走；或激扬文字或思索路径；或关注现实或憧憬理想，而国民性问题的凸显也逐渐成为近代中国社会仁人志士设计救国方略重点关注的话题，国民性的认知、梳理、批判以及改造或重塑成为近代中国救亡与启蒙的时代主题之一。

一 问题的性质

人类发展的历史总是显示出内在的逻辑线索，我们可以简约地将其视为一种螺旋式演进的模式，而跨越、复归、错位、误读、

^① 辜鸿铭：《中国学》，1883年《字林西报》10月31日和11月7日两次刊载。参见《中国人的精神》，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2—126页。这或许是中国人首次提到“中国学”的概念！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1979; 爱德华·赛义德（亦译萨义德、赛伊德等）著：《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尽管赛义德、萨达尔、提巴威、阿拉塔斯等一批学者重点在于以西方的东方观来批判西方学术“对东方的想象和构建，并非为了理解东方，也不在于东方对自身的理解……西方所要解释、说明和论证的是其自身的时代关注”。这种所谓“东方主义”显然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后殖民精神的凝聚，但是它所引发的关于包括或者主要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问题的思考确也蕴涵了积极的学术意义——关于东方问题研究的“东方主义”批判。参见齐亚乌丁·萨达尔著：《东方主义》，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曲解等诸种现象只不过主要是“描述的历史”对“存在的历史”的理性诠释的尝试，诠释本身无论以何种形态作为表述方式，也还是在努力寻求“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国近代国民问题的研究应该是长久以来“中国问题”逐渐世界化后的逻辑结果，这一结果不仅仅是对于中国人自我认识而言，对于西方人作为“他者”的认识也同样具有历史逻辑的合理性。因为“中国问题”的形成是在“世界体系”范围内的一种历史与逻辑的系统思考，是在人类（文化）交往过程基础上相互碰撞、矛盾、纷争与困惑的比较中获得学术定位的。这样，展示中国问题中的国民问题研究的致思路向也就必然需要对问题的由来、形成、深化和延续等进行一番厘清，以便把握问题从历史经现实到未来的演进脉搏。

就国民性问题而言，无论人们给出了什么样的概念界定或者干脆否定其作为问题存在的合法性理由，^①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她真实地存在过并一度引发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兴趣，成为“中国热”或“中国风”中的一个日益显著主题，而且至今仍然成为人们话语言说的内容之一。如何看待国民性问题的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价值，不仅指涉国民性问题本身研究的意义，而且对于近代中国救亡与启蒙乃至现代化运动的走向及其成就的评价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首先，从国民性问题本身来看，她应该是社会行为主体的自我启蒙运动，是一种彰显主体意识或精神的人文关怀。尽管存在着其作为真命题的合法性质疑，但是事实是作为民族国家的基本构成单位的“国民”确也显示出心理特性、思维方式、传统习俗、文化取向以至行为方式等诸多方面的差异，而且这种差异还随着民族国家的演进呈现出自身固有特性的执著延续与文化交往

^① 参见袁洪亮《“国民性”概念的辨析与界定》，《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1期；《中国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研究综述》，《史学月刊》2000年第6期。

中的冲突/融合所导致的某种变异类型的独特性，即“民族文化”的印痕不管经由多少层面的变异或转换仍旧在延续着核心主题的强劲旋律，表达着作为文化共同体的坚韧生命力。这种独特性可以在多个学科视阈中加以诠释：心理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学、文化学、哲学等，但其主旨不外乎集中表述中国国民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的某种较为稳定而普遍的文化倾向性及其在社会生活实践中产生的影响作用，表现出浓郁的人文主义启蒙色彩。因此，国民性问题凝聚着作为民族觉醒使命实现的主体性关怀，而这种主体性关怀实际地又渗透着社会变革蕴涵的人文环境客体性驱使的作用——主体性的自我关切程度与方向受到特定环境的激励和约束。正是变革主体的理性回应成就为其痛苦中抗争的历史洪流，将近代中国社会推向一个又一个思想解放的高潮。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主体意识的自我觉悟首先来自于知识精英主体人格的生成，即作为近代中国社会生存境遇的反思者，他们在民族意识上获得了一种立足于现实的思变心理冲动，并进而将其视为变革现实的普遍使命或道德情感，在学理性思考的基础上形成较为系统的逻辑构架。当这种独立自觉意识达到难以平抑的状态时，一种唤醒整个社会以拯救民族危机的思潮便应运而生，通过国民性问题的表述方式来凝结主体意识觉醒的程度，也便符合近代中国社会进步发展的历史进程。

其次，从近代救亡与启蒙的历史现实来看，国民性问题的省思是在国人寻求救亡图强出路陷于阻滞状态的一次更为扩充性的理性选择，而且这种选择带有明显的科学（理论）色彩。如果以近代中国救亡图强和学习西方运动主题从“器物”经“政制”到“文化”为基线的话，承认每一话语主题的凸显均蕴于此前问题认识的成绩之中应该无可争议。30余年仿效西方先进技艺所营造的洋务神话的悲惨结局实际上在其鼓吹者阵营中就已产生了某些怀疑，如冯桂芬的“四不如夷”认识中已经涉及制度缺

失的危害，并也肯定了西方强大中国羸弱之关键即是人的问题。^①再如王韬关于洋务学习西方“器艺技巧”“仅袭皮毛”的认识，以为“皆因循苟且，粉饰雍容，终不能一旦骤臻于自强。……要之在人而已矣”；并将“重民”、“治民”、“治兵”视为“今日我国之急务”，^②认为“今夫富国强兵之本，系于民而已矣”，而“善用其民者，首以作民之气，次有以结民之心”。^③同时，其他一些早期维新思想家也都不同程度地介绍西方的政治制度，提出改革政治制度的主张。而五四新文化鼓吹的包括“科学”与“民主”在内的文化革命思潮实际上在戊戌时期就已经初见影响，甚至在很多方面显示出维新志士言说的共同主题。^④所以，救亡的主题从一开始就伴随着国民启蒙的深沉使命，这一使命一直伴随着觉醒的中国人艰难行进的脚步，即使在战火纷飞的激情年代也不曾间断过，只是其表达的方式有所区别而已。在这一过程中，近代思想家都力图在理论上寻到某种符合逻辑的支持资源，从传统的变异思想智慧、三世进化模式到西方社会进化论、社会有机体说、宪政理论、自由民主以及科学知识 with 精神的自觉传播和运用，无不表达着国人的不懈努力。对于国

① 即“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其中谈到“有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凡有心知血气莫不冲冠发上指者，则今日之以广运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而受制于小夷也。……非天赋人以不如也，人自不如耳。……如耻之，莫如自强。……彼何以小而强，我何以大而弱，必求所以如之，仍亦存乎人而已矣”。参见冯桂芬著，戴扬本评注《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97、198页。

② 参见王韬著，陈恒、方银儿评注：《弢园文录外编·变法》（上、下），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2、56页。

③ 参见王韬著，陈恒、方银儿评注：《弢园文录外编·重民》（上），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60页。

④ 参见教军章《戊戌：近代科学与民主思想的初成》，《求是学刊》1998年第3期；《论戊戌思潮对五四的影响》，《学习与探索》1998年第5期。张锡勤：《批判与创新：五四与戊戌的共同精神》，《学习与探索》1999年第3期。

民性问题而言,进化论和社会有机体说无疑是最为基本的理论阐释武器,其他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知识的引介均是以此为基础来为解释存在问题服务的。由西方思想蕴涵的科学精神强调变革社会的逻辑合理性,对于国民性(批判)理论的构建给予了根本的指导,也使近代中国知识精英超越了传统学术范式的限域而完成了近代化转型的艰难任务,在救亡的阶段性阻滞螺旋中攫取启蒙的新动力,从而将近代中国理性反思思潮推向前进。

最后,从中国社会的近代化或现代化历程来看,国民性问题研究实际关涉到现代化实践的基础性因素——中国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显然不只是个体人现代化的问题,而是民族和社会的现代化,是人的共同体——国民集体——的完整现代化问题。我们可以将现代化问题置放到社会发展理论与实践的视野中来审视。20世纪中期开始是人类高度重视“发展”(development)问题的时代。最初的理论研究时常被人们称为“原生现代化理论”——“西方人的西方现代化研究”。^①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主导发展问题研究的是被称为新生的现代化理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研究”。^②20世纪70年代以来是一种“后现代化”

① 指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批思想家如托克维尔(Charles Alexis de Tocqueville, 19世纪法国政治思想家)、马克斯·韦伯、沃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 19世纪德国经济史学家)、迪尔凯姆等为代表从不同的学科角度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现代化发展的问题。参见周穗明等著《现代化:历史、理论与反思——兼论西方左翼的现代化批判》,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版,第216页。

② 它们包括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多斯桑托斯(T. Dos Santos)等的依附理论、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理论等。当然各种理论的代表人物还有很多,如受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影响探讨美国现代化发展问题的学者列维(M. J. Levy)、英格尔斯(Alex Inkeles)等;支持依附理论的学者包括拉美经委会的核心学者普雷维什(R. Previsch)、欧美学者巴兰(P. Baran)、斯威齐(P. Sweezy)、阿明(S. Amin)、弗兰克(A. G. Frank)等。他们从后发国家现代化发展的路径选择研究出发,把有关发展问题的研究推到了全球化视野,确定了“发展主义”的学术地位。同上书,第232页。

或“后现代化社会”的新发展理论。^① 在理性反思过程中，人们终于认识到人的现代化发展的整体性意蕴，明确了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实际上具有空间的整体系统性和时间的恒久持续性的意义，“从长远的观点看，经济增长对穷国来说是减少贫困的一个重要条件。但它不是充分条件。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其发展潜力的发挥取决于政策。一个经济增长缓慢或微不足道的国家也许正忙于重建它的政治制度，以便经济增长到来时能由此带来发展。从长远看，这样一个国家的发展速度，可以超过一个目前增长速度快，但政权牢牢掌握在少数富人手中的国家”。^② 如果我们从历史逆推的维度反观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程，不难看出有关国民性问题的研究恰恰就是探索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的理论与现实的基点，这也是所有民族现代化发展不可回避的恒久性基础课题。

二 研究的状况

中国国民性问题的明确提出如果从戊戌维新思想家算起至今已有百余年历程，如果以指涉到这个问题——非专门讨论本问

^① 伴随着西方发达国家进入经济的“滞胀”时期和战后日本、德国（当时的西德）经济发展的迅猛势头以及亚洲“四小龙”的异军突起，在全球引发了对发展新理论思考，而众多的经济后发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多元化道路的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又为关于发展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应用平台。这其中产生较大影响的有佩鲁（Francois Perroux）的新发展观、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以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为代表的法国年鉴派的新资本主义论和90年代以后的美国发展主义、东方主义等。这些理论不仅涉及后发国家的发展问题，而且同样为受到现代化困扰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提供对策，实际上是在文化多元化语境下重新思考人类发展问题的尝试。

^② [英] 杜德利·西尔斯：《发展的含义》。转引自塞缪尔·亨廷顿等著《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53页。

题——算起可能要经历了数百年的历史时期，如 13 世纪中叶的《蒙古行记》中已多少猜测了一些中国社会及其特点。仅以中国近代时域为限，据现有资料来看，约从 19 世纪中叶开始在华外国人即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初步涉猎，^① 如 1849 年英国人亨利·查尔斯·萨（Henry Charles Sirr）写就《中国和中国人》一书，对中国人的一些性格特点进行了圈点——孝、贞节、乏公正、欺诈、获利、吃苦等。为此，沙莲香先生在《中国民族性（一）》中对有关文献进行了专门梳理：1849 年的《中国和中国人》、1854 年法国人古伯察（Regis - Evariste）《中华帝国追想》、1856 年英国人密迪士（麦多士，Thomas Taylor Meadows）《中国人及其叛乱》、1858 年英国人库克（George Wingrove Cooke）《中国》（通信集）、1872 年英国人约翰逊（Sanuel Johnson）《东方宗教及其与世界宗教的关系》、1872 年英国人麦华陀（Henry Walter Medhurst）《在遥远中国的外国人》、1877 年德国人利希霍芬（F. F. Richthofen）《独立种族》等，到 1890 年美国史密斯（Arther Henderson Smith，1845—1932。也译为“史密斯”，中文名字“明恩溥”）写就《中国人的气质》（特性、性格），大致描述了在华外国人先于国人最早从整体维度论说中国国民性格特征的状况。^② 在此之后，中国人主要从戊戌维新思想家开始，经过 20 余年的不间断救亡革命和文化启蒙，逐渐将国民性

① 据美国学者何伟亚（James L. Hevia）撰写《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所列文献看，1843 年 Jacob Abbott 就写出了《中国和英国，或中国人与外国人交往中表现出来的性格与方式》（*China and the English, or the Character and Manner of the Chinese as Illustrated in the History of Their Intercourse with foreigners*, New York: William Holdredge）一书，主要对中英民族交往中的性格趋向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描述。

② 参见沙莲香编《中国民族性（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